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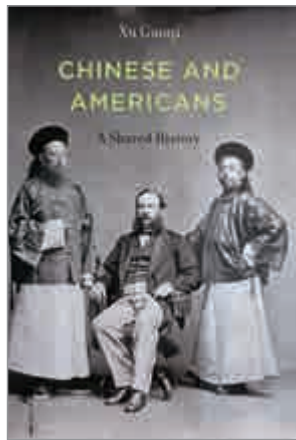
「一戰」在西方歷史很熱，但國內對這個學科卻不太重視，缺少深入的研究。「帝國主義之間狗咬狗的戰爭」顯然不是一個正確的解讀。

### 「華工」研究的尷尬

徐國琦說：「一路以來，國內對華工的研究有些「不便之處」。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實為北洋軍閥統治，如果說北洋政府做了什麼業績，對國共兩黨都不是太好，所以台灣及內地學者都少研究這個課題。」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與大戰》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於本月十五日出版



▲《一戰中的華工》七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華工到達西方戰場後，接觸了當時西方先進的武器和文化。徐國琦稱：「一戰時，坦克是最精裝的武器，華工當時有三個團，專門在坦克工廠工作，修坦克，維護坦克，一個團約五百人。剛開始，英國人不讓外人接觸他們的武器，但後來發現，華工的技术比他們更好、更快，後來又將飛機維修工作交予華工。」

華工都是很年輕的，出國後，他們與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印度等國的人一起工作生活，也接觸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他們戴上了瑞士手表、太陽鏡，喝起了咖啡，還參與拍攝有關其工作及生活的一戰宣傳片（無聲電影）。

當時的法國女人喜歡和華工結婚，因為法國男人在前線死傷慘重。而華工的身體很健康，在出國前都經過嚴格的體檢。此

一戰期間，十四萬個目不識丁、多為農民出身的中國勞工「以工代兵」奔赴歐洲戰場。《一戰中的華工》講述的就是這些勞工們關於一戰、關於歐洲、關於他們所接觸的西方的人生經歷。他們挖戰壕、修鐵路，甚至搏殺於前線；他們也戴瑞士表、戴太陽鏡、與法國女人談戀愛。他們為中國參戰及加入巴黎和會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該書作者、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近日接受本報專訪，談及今年一戰書籍的「出版熱」，除了戰事一百周年，徐國琦告訴記者：「這也與中共想重新定位一戰有關。我作為一個學者，我的發言稿沒有任何限制，卻被中央黨校的《理論視野》一字不漏地登出來。」

大公報記者 屠薇如

# 西線戰場 陌生客



▲華工團的華工正在歐洲戰場挖戰壕

代工會之一。他們每周召開一次會議，討論如何維護自身權益，擁有一千六百名成員。徐國琦說：「這是一股重要的先進力量，在後來的五四運動中，華工在歐洲的經歷，使他們對於工會及罷工的組織都起了推動作用。」

然而多數華工還是回到鄉下。「有大多數華工的故事還有待挖掘，要訪華工的後代，仔細地蒐集檔案和資料，這需要沉下心，甘於寂寞，但目前我似乎發現很少真正能做到的國內學人。急功近利，是現在一些年輕學者的不足之處。」徐國琦表示。

到「文革」期間，甚至有華工因被扣上「為帝國主義賣命」的帽子而自殺。無奈華工大多不識字，不能說出、寫出內心的思想及其精彩的戰地故事。

實際上他們有「苦」也有「力」，他們確實影響了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平民教育家晏陽初說華工的貢獻是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爭得了一些主權，而他因為曾為華工服務的經歷，也改變了他的人生，讓他開始一輩子獻身於中國及世界的平民教育；一九一八年，蔡元培還提出「勞工神聖」的口號。通過晏陽初、蔡元培這些人直接跟華工接觸，使他們認識到，華工雖然是苦力，但也對中國國際化進程起了推動作用。

一戰華工的故事仍在被發掘中，但現在可以確認的是，對於他們來說，東方和西方確實相遇了，而且是通過這些農民來實現的。正是這些中國人，不僅在西方戰爭上為協約國的勝利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也承擔了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使者角色。



▲華工可見聞發表於《華工雜誌》上



▲華工們的舞龍舞獅之景

徐國琦將自己稱為「橋樑」：「國外學者研究一戰會覺得和中國沒太大關係，我現在好像個橋樑，而我所謂的「貢獻」，或許就是掌握了「發聲權」，中西方都能接受我、認可我，可以讓我真實地還原一段歷史，讓西方學者無法迴避中國與一戰的關係，同時也讓國內讀者了解一戰對中國的影響及中國對一戰的貢獻。」

徐國琦也在將這段歷史的片段更多地展現出來。《一戰中的華工》英文原著被哈佛大學出版，因為其中有很多當節節馬賽。被法國政府「華工」的歷史，而很多當地人對此一無所知，因此被加拿大多家媒體報道及採訪轉載。

一戰頭兩年，戰壕戰已經奪去了數十萬人的生命，人力是參戰國當時最頭痛的問題。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的顧問梁士詒見英法俄的駐華外交官手無寸鐵的中國勞工。法國立即接受了這個提案，英國一開始拒絕，但最終在一年之後的一九一六年接受。

這些華工名義上為私營苦力，但實際上為英法兩國提供與戰爭有關的服務。中英法三國政府均在幕後大力支持。美國參戰後，也向法國借調了大約一萬名華工為其遠征軍服務。第一批華工在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從天津的港口出發，前往法國南部的馬賽。被法國政府招募的華工與法國簽署了一份五年的合約，其中保證他們在法國的節日和中國的國慶日可以休假。英國選調中國政府的代理公司，直接在山東招工。被招募的工人簽署了三年的合約，其中規定他們每天工作十個小時，每周工作七天。「當時中國政府還設有保僱委員，當華工的權益受到威脅時，他們會去出頭露

面，與英法美政府部門交涉。」徐國琦說。華工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但也有一些有知識的。徐國琦舉例說：「比如山東淄博人孫幹，他是一個學校老師，家有老妻後子，卻想看看國外的世界，所以他也偷偷地報名了，回國後還寫了一個有關其華工生活及觀察的回憶錄。」



▲華工們利用廢舊炮彈皮製作的戰地工藝品



▲華工張長松的全家福相片



▲拆卸鐵絲網的中國工人

### 先鋒書榜

- 社科類
一、靈魂
出版：北京聯合出版社 作者：[美]加里·祖卡夫
二、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
出版：九州出版社 作者：郭長城 趙剛等
三、所謂伊人——傅抱石侍女畫集
出版：譯林出版社 作者：萬新華 黃海濤
四、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
出版：譯林出版社 作者：[意]翁貝托·艾柯
五、21世紀資本論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法]馬斯·皮凱蒂
人文、小說類
一、雨中百合般的愛情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蘇七七
二、原來他鄉是故鄉：司徒雷登回憶錄
出版：江蘇人民出版社 作者：司徒雷登
三、最後的曼珠莎華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作者：李展鵬
四、八百萬零一種死法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唐諾
五、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胡頌平
資料來源：先鋒書店

## 徐國琦的中美研究

一九八四年，徐國琦在安徽師範大學畢業後，成為南開大學著名美國史專家楊生茂教授的美國外交史專科當年唯一錄取的學生，他說這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讀書生涯。一九九〇年，徐國琦來到哈佛大學，成為美國史大家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博士生。

哈佛歷史系的博士訓練很嚴格。除了讀完規定的學分外，還必須通過兩種語種考試（英語不算），徐國琦選了德語和法語。此外，再通過四門學科的資格考試後，才能成為博士候選人，進入博士論文階段。博士論文非常重要，因為它大都成為自己的第一本專著，成為拿到教職的敲門磚。但徐國琦的博士論文卻是自己找上他。「記得是上入江教授的『國際史討論班』時，教授列出一個書單，每個學生需從中選一本書，精讀後向全班報告該書的可取之處及

缺點。我不知什麼原因遲到了，最後就剩一本沒人挑的書歸了我，那本書可以說影響了我一輩子，是詹姆斯·約爾（James Joll）所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當時沒人挑，我就「被」挑到這本書。我讀完後，向老師及同學報告稱，覺得此書還不錯，但可惜書中沒有亞洲的聲音，也沒有中國的聲音。入江昭當時就說，那你就趕鴨子上架，寫寫中國人的聲音吧。誰料寫完後，論文得到教授的肯定，並建議以此題目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後來我這個一九九九年的哈佛博士論文也被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以《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中國與大戰）一書名在二〇〇五出版，並於二〇一一年再版。國內的上海三聯書店於二〇〇八年將此書收入其三聯人文經典文庫出版中文版。這本書無疑對徐國琦很重要，但他談及自己的新書——《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

本報攝 八八二年代的波士頓，已經有一位中國詩人艾觀化成為哈佛大學首位中文教師，並在當地積極推廣中文及文化傳播。徐國琦還仔細查閱了美國兩位學者對中國政治經濟上的貢獻，法學教授 Frank Goodnow（弗蘭克·古德諾）和哲學家 John Dewey（約翰·杜威）。弗蘭克·古德諾曾為袁世凱組建政府時效力；約翰·杜威在北京大學等地做訪問學者時，也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了推動作用。

